

世界文学译丛

战争与和平(下)

周殿富◎主编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华伟◎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示了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让人如临其境。

战争与和平

世界文学译丛

战争与和平(下)

周殿富◎主编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华伟◎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86
第三部	155

第二卷

第一部	229
第二部	272
第三部	329
第四部	387
第五部	428

第三卷

第一部	489
第二部	550
第三部	663

第四卷

第一部	755
第二部	796
第三部	829
第四部	865

尾 声

第一部	911
第二部	952

第三部

—

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能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只有当人们任意从这一运动中抽取某些部分进行研究时,他们才能逐渐理解这一规则。与此同时,由于连续的运动被任意分割成不连续的若干小部分,人类就产生了很多谬误。

古代有个著名的学术所谓诡辩论,叙述的是阿喀琉斯永远也追不上前面的乌龟,即使他的速度是乌龟的十倍:当阿喀琉斯走完他与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又在他前面爬过了这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喀琉斯走过这十分之一距离时,乌龟又爬过百分之一,以此类推,永不停止地如此进行下去。这个问题在古人看来是个不解之惑。阿喀琉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因为阿喀琉斯和乌龟连续不断地运动,被随意地分割成许多不连续的部分。把运动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片段,我们只能更加近似于问题的答案,但是永远也得不到更不可能得到答案。直到我们采取了无限小数,并且由此产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级数并求得几何级数的总和,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新的数学学科已经探索出了解决无限小数点的办法和解决一些其他更复杂的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运动问题的途径。

这个古人不知道的数学这一新的学科,在研究运动问题的时候,应用了无限小数的概念,换句话说,运动的主要条件重视了,从而纠正了人类由于用运动的个别部分去代替连续的运动而犯的不可避免的错误。

探索历史运动法则时,出现了与此相同的情况。

多数人的随意行为形成了人类的连续行动。

史学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一运动的法则。为了认识由人们的各种任意行为而形成的连续运动的法则,人类的智慧却随便地把连续的运动分割成间断的部分。史学采用的第一种方法是从连续的事件中随机抽取几个,独立地进行研究,事实上任何事情都不存在开头,因为一个事件总是衔接于另一个事件之后。

第二种方法是把某一个统帅或一个沙皇,某一个人的行为看做是人们任意行动的总和来加以研究,而实际上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不可能反映人们任意行为的总和。

历史科学在研究运动时,总是把它分割成足够小的单位,通过这种方法的研究使其尽量接近真理。但是不管选取的单位如何小,我们觉得,假设有独立存在的单位,假设某一现象有开头,假设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能表达所有人的任意行

为,那么这种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历史结论,批评家弹指一挥地就能把它驳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这是因为批评家能选择或小或大的不连续的单位作为观察对象,永远有权这样做,因为历史单位总是任意取出来。

只有抽取无限小的计量单位,并且找到它们的求积分的方法,我们才会希望了解历史的法则。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涌现出几百万人非同一般的运动。习惯了职业被人们舍弃,他们从欧洲的某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互相屠杀和抢劫,失败和胜利,几年的时间,整个生活进程改变了,出现一种先进步后衰退的激烈运动。人类的智慧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则能调控它?

史学家们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时,向我们讲述了数十个人在巴黎城内一座建筑物里的行动,把这些行动称做革命。然后详细地叙述了拿破仑和与他相关人们的人生经历;其中包括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并指出:这就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便是它的法则。

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但否认这种解释,而且直截了当指出,这种解释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解释把最弱的现象当做最强的了。人们任意行为的总和形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正是那些任意行为的总和容忍了他们,也毁了他们。

“但是每当有征服时,便有征服者;每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变革时,便有伟人。”历史证明,的确,有征服者,就有战争,人类的智慧回答,但是这并非可以说明征服者是战争的导火线,也并不能说明从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得出战争的法则。每当我看到我的表,时针指向十的时候,就听见旁边教堂钟声响起,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教堂的钟运动是由时钟的位置引起的。

看到火车头启动,我就听见汽笛叫,同时看见车轮转动和气门打开,但是我无法因此得出结论说,车轮转动和汽笛叫是由于火车头启动引起来的。

农民说,暮春吹起冷风,是因为橡树发芽了,确实,每年春天橡树发芽的时候,都会刮冷风。虽然我不明白橡树发芽时为什么会刮冷风,但是我并不赞同农民所说的橡树发芽是由于刮冷风引起的,因为风的力量与树芽是不相关的。我看见在任何生活现象中总会出现一些条件的偶合,我也看出,不管我如何用心地观察火车头的气门、时针和橡树芽、轮子,我也无法知道火车头、钟鸣和春天的风运动的原因。要想弄明白,我必须毫无保留地改变我的观察点,去探究钟、蒸汽运动和刮风的法则。研究历史也是如此,并且已经开始尝试这样做了。

研究历史的法则,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观察对象,去研究那些相似的支持群众的无限小的因素,并且抛开帝王将相。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样做在认识历史法则方面能取得很大成就,显然,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可以探索到历史的法则。人们在这方面付诸的智慧,还不到史学家们在叙述帝王将相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活

动的看法时所付出努力的百万分之一。

二

能够使用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俄国。俄国居民和军队撤退到了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撤到了勃洛杰罗,以逃避冲突。法国军队以加速度冲向它运动的目标,冲向莫斯科。离目标越近,冲力就越大,就像一个自由落体,距离地面越近,下降的速度就越快一样。在距离它后边几千俄里是充满敌意的国土,前边离它的目标只有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名士兵都清楚这一点,侵略是靠它的冲力自然而然地进行。

俄国军队越是撤退,对敌人就越是恨之入骨。在后退中它集聚了力量,发展起来。在勃洛杰罗进行了一次交锋。双方的军队都未瓦解,但是俄国军队在战后立刻撤退了。这好比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具有更大冲力的球,必然反弹回来一样;那个飞驰而来的侵略的球,虽然由于撞击失去了所有力量,但由于惯性又向前滚动了一段。

俄国人撤退到距莫斯科一百二十俄里的地方,法国人进攻到莫斯科,就在那里驻扎下来,此后五周内没有发动战争。法国人按兵不动,就像一头伤痕累累的野兽一样,流着血,舔着伤口,他们连续五周待在莫斯科,无所事事,突然,没有任何理由地向回逃去:他们奔往卡鲁卡大路,在打了一场胜仗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一场大仗,就很快逃回并越过斯摩棱斯克,逃向维尔纳,逃过别列津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去。

八月二十六日夜間,全部俄军和考托罗佛都相信,勃洛杰罗战役取得了胜利。考托罗佛就这样禀报给了皇帝。他宣布了准备新的战斗,以彻底打败敌人的命令。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他只知道敌人被打败了,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但是,当晚和第二天,不断传来军队损失半数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事实上新的战斗已不可能了。

在伤员还未运回,情报还未收集起来,阵亡的人数还未统计出来,弹药还未补充到来,士兵还没吃饱睡足、代替战死者的新指挥官还未上任的情况下是再也无法战斗了。

同时,就在那场战斗后的第二天清晨,法国军队已经自动地向俄军攻击。考托罗佛计划在次日发动进攻,全军也希望如此。但是要发动进攻,只有意愿是不够的,还一定要有那样做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否定的。必须推迟一天的行程,随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同样一定要后撤,最后,在九月一日,当军队靠近莫斯科时,虽然部队士气高昂,但由于客观情况军队不得不退至莫斯科以东。于是军队又退了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交给了敌人。

有些人习惯于认为战役和战争的策略是由统帅们制定的,其实统帅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地图,设想他该如何部署某一战役,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何在退到菲利前不据守一个阵地,什么原因使考托罗佛在撤退时不立刻放弃莫斯科、奔卡鲁卡大路,或其他,等等。习惯这样想的人们不记得了,也可能不知道,无论哪个总司令的行动都是在无法变更的条件下采取的。我们毫无约束地坐在办公室里,在地图上考察某一战役,已知双方的地形、兵力,从某一已知的时间开始考虑我们的计划;这与总司令的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总司令永远不会处在某一事件开头的条件中,而我们总是陷入那种条件下研究某一事件。总司令常常处在一系列事件的运动中,因此他不可能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所有意义。事件在悄无声息地随着时间不断显露出其意义,在这过程中,总司令处于最复杂纷繁的忧虑、阴谋、建议、方案、权势依附、威胁、欺骗相互交织的中心,必须常常回答无数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科学家特别认真地告诉我们,考托罗佛在到达菲利以前,就应当把军队转移到卡鲁卡大路,甚至有人曾经向他提出过这样的方案。但是在总司令面前,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刻,经常不止一个方案摆在面前,而是几十个方案同时并存。而所有这些根据战术和战略制定的方案都是互相矛盾的。

总司令的任务看似只是从这些方案中挑选出一个。甚至他做到这一点都很困难。事件和时间不会等待。如果说,二十八日,有人向他提出越过卡鲁卡大路,但是,这时莫洛拉多维奇派副官来问,他是与法国人交火呢,还是退却,他必须马上下达命令。而退却的命令使我们离开转上卡鲁卡大路的地方。接着,野战医院院长也来问,把伤员运到何处去,一个军需总监也来请示,把给养运到哪里去,信使从彼得堡带来皇帝的一封信,要保卫莫斯科,而总司令的那个总想陷害他的政敌,提出一个新计划,与转向卡鲁卡大路的计划背道而驰,而总司令需要补充营养和充足的睡眠,一个可敬的将军由于没有得到奖赏前来申诉,居民来祈求保护,一个派遣去视察地形的军官回来所报告的情况与完全不同于先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情形,而俘虏、探子和负责侦察的将军,对敌军的情况描述得如出一辙。那些人不能够明白总司令活动中碰到这些必然的条件,比如说,谈到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总司令在九月一日完全可以坚守莫斯科或者自由地决定放弃,而实际上,俄国军队离莫斯科仅有五俄里,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何时决定的呢?在斯摩棱斯克,在德里萨,最确切的是八月二十四日在什沃尔基勒,二十六日在勃洛杰罗,在从勃洛杰罗到菲利的撤退过程中的每分每秒决定着。

三

俄国军队从勃洛杰罗撤退后,驻扎在菲利。叶尔莫洛夫勘察阵地后,前来拜见陆军元帅。

“怎么能在这样的阵地上作战。”他说道。考托罗佛用惊讶的眼神瞅了他一下,示意他把这话重复一遍。听他说完以后,考托罗佛把手伸向他。

“给我你的手,”他说道,然后把那只手翻过来,摸了摸脉,说道,“你不舒服啦,亲爱的。仔细想想你说的是什么。”

在距离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之遥的俯首山上,考托罗佛跳下马车,在路边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群将军把他围起来,从莫斯科来的劳森汤帕希伯爵也在其中。这群重要人物分成几组,都在讨论军队的状况、阵地的优缺点、莫斯科的情形以及提出的计划,总之是谈论军事问题。他们都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军事会议,虽然没有组织者召集这个会,也不叫它军事会议。大家谈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有人问到或谈到私人事情时,也总是低声说,而且立刻又转到同一个话题上去。在这些人中没有笑声,也没人开玩笑,甚至看不到笑容。显然所有的人都努力表现出不负使命的样子。各组的人,在交谈时,都尽量离总司令近一些,以便让他能听见他们的谈话。总司令听着他们的谈话,有时请他们把话再重述一遍,但是他自己却不发言,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听了这一组或那一组的谈话以后,几乎都是带着失望的表情转过身去,他们谈的与他想知道的事差之千里。选定的阵地有些人在谈论,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那个阵地本身,还不如说是选这个阵地的人的智慧。另一些人证明早就犯下了错误,两天前就应打一仗。第三组人谈论的是萨拉曼卡战役,一个才来的穿西班牙制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述了战役的情况。在第四组里,劳森汤帕希伯爵谈到,他预备与莫斯科市的民兵一起战死在首都城下,不过令他遗憾的是,他对情况一无所知,要是他早一点知道,事情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第五组炫耀他们战略思想的高深,正在讨论部队向什么方向发展。第六组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价值。考托罗佛越来越愁思满怀,忧心忡忡。从这所有谈话中,他只看出一点:毫无保留地讲,这是多么坚定不移,保卫莫斯科已毫无实际可能,如果哪个总司令下令打一仗,他一定是发疯了,不仅一定会发生混乱,而仗还打不成;仗之所以打不成,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但认为阵地十分糟,就连他们的谈话也只讨论阵地不可避免地放弃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指挥官们怎可以把他们的部队带到他们认为特别糟的阵地上去?下级军官们,甚至士兵们也认为那阵地特别糟,因此不能怀着必胜的信念去打仗。巴涅戈斯坚持守卫这个阵地,别人还在讨论它,这个问题已成为搞阴谋和争论的一种借口,使得它本身已经毫无意义了。对这一点他很清楚。

巴涅戈斯选定了这个阵地,表现出俄罗斯人的爱国热忱,强烈坚持保卫莫斯科的原则。考托罗佛把他的目的看得清清楚楚:保卫失败,则归罪于主张不打一仗就把军队直接带到麻雀山上去的考托罗佛;成功了,功绩属于他自己;遭到拒绝,就会推卸掉自己对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是这个老人此时无视于这个阴谋。他只关心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他无处得到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

是：“难道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我何时这样做了？这是在何时决定的呢？是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还是前天晚上我打了一个盹，让巴涅戈斯指挥的时候呢？或许更早些？但是何时决定的这件恐怖的事？必须把莫斯科放弃。军队必须撤退，不得不发出这个命令。”他觉得，发出这道恐怖的命令，就好比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他热衷于权力，习惯了掌握大权，他坚信，他命中注定要来拯救俄国，因此才背抗皇帝的旨意，按照人民的意志，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危难时刻，只有他自己能指挥军队，只有他自己能毫无畏惧地把常胜的拿破仑作为对手，因此，想到他必须发布那道命令，他就觉得毛骨悚然。但是必须得要采取某种决定，结束他四周这变得越来越不着边际的谈话。他把那些高级将领召集过来。

“看来只有依靠我的脑袋了，不管它是好是坏，我的智慧，全靠它了。”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上马就向菲利奔驰而去，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四

午后两点钟，在农民昂得列·萨沃斯季亚诺夫那间比较好的，较宽敞的农舍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那个农家大家庭的所有人都挤入过道对面那阴暗的小屋子里。只有昂得列六岁的小孙女玛拉莎留在大房间的炕炉上，勋座很喜欢她，喝茶时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坐上炕炉上高兴地用怯生生的眼神看着依次走进房间的将军们的脸、勋章和制服，他们在屋角神像下的小凳子上依次就座。爷爷一个人在炉子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坐着。他坐在一张折叠的扶手椅里，不停地清嗓子，拽拽外衣的硬领，敞开的领子还是卡着他的脖子。进来的人陆续来到陆军元帅面前：他与一些人握握手，向另一些人点点头。他的副官凯萨罗夫正准备拉开考托罗佛对面的窗帘，但是被考托罗佛制止住了，凯萨罗夫明白了，勋座不想让人看见他的脸。

勤务兵们又拿进一条板凳来，放在那张上面摆着纸、笔、计划、地图的农家的松木桌旁边，因为桌子周围聚着很多人。凯萨罗夫、叶尔莫洛夫和丹奥等坐在这条板凳上。桌子的最前面，在圣像下面，坐着巴克雷·德·托利，他那凸起的前额与秃顶混为一体了。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圣乔治十字勋章，一副快快的神态，脸色苍白。他连续两天都在发烧，现在还浑身酸痛，发抖。沃尔朗弗坐在他旁边正在悄声地给巴克雷说着什么，还伴随着很快的手势。又短又胖的多赫图罗夫正高挑着眼眉，两手交叠在肚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奥斯特曼—丹奥斯特伯爵坐在另一侧，他用手支着他那面部线条豪放、镶嵌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的宽大的头。拉耶夫斯基显现出不耐烦的神情，用习以为常的动作把鬓角上的黑发向前抹了一下，一会儿看看考托罗佛，一会儿看看门。科诺夫尼岑那清秀的、坚定的、慈善的脸上浮现出一种狡黠的、温柔的笑容。他的目光和玛拉莎的目光相互碰

撞了,向她挤眼睛,把那个小女孩给逗乐了。

大伙全都在等巴涅戈斯来了开始会议,其实他正在享用那美味的午餐。从四点钟等到他六点,人们小声聊些不相干的事。

巴涅戈斯一进屋,考托罗佛就离开了他的角落,向桌子靠近一些,但是桌子上的蜡发出的微弱烛光还是照不着他的脸。

巴涅戈斯以一个问题开始了这次会议:“是不战就放弃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随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沉寂。每个人的脸都阴沉着,在一片寂静中只有考托罗佛愤怒的咳嗽声和吭哧声。所有的目光全聚集在他身上。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清楚地看见他怎样把眉头皱起,看样子快要流泪,但是这种情形持续的时间很短暂。

“古都!俄罗斯的神圣!”他突然,用愤怒的声音重复着巴涅戈斯的话,以此指出这句话的虚伪性。“阁下,让我告诉您,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请各位先生来探讨的是一个军事问题。拯救俄国要靠军队,这个问题就是,是冒着失去莫斯科和军队的危险进行战斗好呢,还是不战就放弃莫斯科?就这个问题我想参考一下大家的提议。”他又坐回到扶手椅里。

讨论展开了。巴涅戈斯仍不服输。虽然同意别人和巴克雷的提议,认为在菲利打保卫战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怀着对莫斯科的满腔热情和对俄罗斯的热爱,提议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进攻法国人的右翼。意见发生了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多赫图罗夫、叶尔莫洛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巴涅戈斯的意见。是觉得只有作出牺牲才能放弃首都呢,还是出于别的考虑?不过这些将军好像知道改变不了这个会议,注定事态发生,现在莫斯科已经放弃。其他的将军们明白这一点,他们抛开莫斯科问题,谈论军队在撤退中应采取的策略。玛拉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面前所发生的一切,对会议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那只是爷爷和“长袍”之间的私人斗争。她看得出,他们对话中充满火药味,她心里支持爷爷。在谈话中间,她看见爷爷快速狡黠地扫了巴涅戈斯一眼,然后,她发现爷爷对长袍说了些什么,把他给镇住了。巴涅戈斯突然脸红了,怒气冲冲地在室内来回走动。巴涅戈斯之所以如此发窘,是因为考托罗佛用那么安详平静的语气对他提出的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动到左翼并攻击法国人右翼的建议分析得很透彻。

“各位,”考托罗佛说道,“我不同意伯爵的策略。在敌人周围调动军队向来是危险的,军事历史证明了这个理论。例如……”考托罗佛在思索着,收集事例,并用天真、明朗的眼神盯着巴涅戈斯。“就以弗里德兰战役来为例子吧,我想伯爵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战役……不太成功,因为我们重新部署的军队离敌人太近了……”接着大约沉默了六十秒,可是大家都觉得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

讨论继续,但是常常中断,大家都觉得无话可说。

再一次停顿,考托罗佛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准备说话。大家把目光都朝向他。

“这么说,先生们,我得来为打碎的瓶瓶罐罐埋单了,”他说着,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桌旁。“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我已经听过了。某些人可能不赞同我。但是我凭着国家赐予我元首的权利,我命令撤退。”

会议结束后,将军们带着严肃谨慎的神情离去,像送完葬各自回家一般。

有些将军低声地,用与他们在会议上完全不同的腔调,向总司令说了什么。

早就等着去吃晚餐的玛拉莎,光着足,踩着炉子的梯磴,面向炉子小心地爬下来,从将军们的腿中间穿过向门外跑去。

把将军送走以后,考托罗佛用臂肘支在桌子上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那个恐怖的问题:“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是谁之过?”

“这一点我没有考虑到,”已经到深夜了,他对来他这的副官施奈德说,“我没想到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您应该休息了,勋座。”施奈德说。

“不,不行!怎么?他们还想同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吗?坚决不可以!”考托罗佛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那时而有力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要,只要……”

五

那时,退出和烧毁莫斯科比军队不战而退更加重要,被认为领导这一事件的劳森汤帕希的行动与考托罗佛背道而驰。

和勃洛杰罗战役一样不战就撤退到莫斯科,这件事——放弃并烧掉莫斯科,是注定的。

每一个俄国人都考虑到这点,不是靠推理,而是靠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感情,就能够预测到所发生的事。

不需要劳森汤帕希和他的传单,从斯摩棱斯克起,在俄罗斯大地上,所有城乡中都遭遇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人民镇定自若地等待着敌人,不骚动,不闹事,没有杀人,冷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在内心里充满了自己的力量,知道在困难关头如何去做。敌人一逼近,最富有的居民抛弃他们的财产就走;最贫困的留下来,烧毁遗留下来的东西。

每一个俄国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意识:事情本来就这样,而且将一直继续下去。一八一二年,在莫斯科的社交界中,不但存在这种意识,而且预感到莫斯科会失守。早在七月和八月上旬已经离开莫斯科的那些人,表明这是他们意料之

中的。那些人把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丢下他们的一半财产和住宅。这样做发源于一种潜在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不是靠献出自己的孩子，也不是靠言辞和其他类似的不自然的行动来表达的，而是简单地、情不自禁地、自然地表现出来的，因而总是发挥最强的效应。

有人对他们说：“逃离莫斯科的全是胆小鬼，逃避危险，那是可耻的。”劳森汤帕希宣传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害怕羞愧做胆小鬼，害怕羞愧离开莫斯科，可是他们还是没有留下来，明知道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走呢？拿破仑在被征服的国家里所犯的恐怖罪行，不能设想是劳森汤帕希拿这些罪行吓走了他们。第一批出走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富有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柏林和维也纳完好无缺，在拿破仑统治的时期，居民和漂亮的法国人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那时俄国男人，尤其是小姐太太们特别喜欢法国人。

对于俄国人来说不存在留在莫斯科，在法国人统治下好坏的问题：在法国人统治下无法生活！这是他们逃离的原因。在法国人统治下的生活是相当糟的。勃洛杰罗战役还没有发生，他们就离开了，战役之后离开的步伐加快，无视他要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打仗的声明，无视莫斯科总督关于保卫莫斯科的号召，无视劳森汤帕希传单中的所有谬言，无视用来消灭法国人的气球。他们知道，打仗是军队的事，军队打输，绝对不会带着小姐太太和家奴们到三山去打拿破仑，所以不管丢下多少财产任人如何销毁，是多么可惜，他们不得不走。他们走了，并没去想这个庞大富有的首都的伟大意义：它被居民抛弃了。他们走了，各有打算，也正由于他们的出走，历史上才永远留下令我国人民引以为荣的一页。那个怕违背劳森汤帕希的命令而留下来的太太，怀着不当拿破仑奴隶的模糊意识，在六月间就带着她的女仆和黑奴离开莫斯科前往萨拉托夫田庄去了，她才真正简单地拯救俄罗斯的伟大事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劳森汤帕希伯爵时而把政府机关迁走，时而羞辱离开莫斯科的人，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把那些毫无用处的兵器分发给一群醉汉，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甫搬走圣骨和圣像，时而扣押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用其中一百三十六辆运载列比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烧毁莫斯科，他怎样放火烧毁住宅；时而写一篇宣言给法国人，庄严地斥责他们破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又暗示焚烧莫斯科的荣誉应属于他，时而又否认此事，时而命令人民捉间谍，交到他那里去，时而又为此责难他们；时而把所有法国人遣送出莫斯科，时而又让莫斯科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下来，却下令逮捕和放逐没有特别罪过的、可敬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时而在三山召集人民去打法国人，时而为要摆脱他们，让他们去杀人，自己却从后门坐车溜掉；时而说他忍受不住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在纪念册里写法文诗谈他对此事的同情态度。这个人反复无常，对所发生事件的意义毫无知晓，只琢磨自己做什么令人举目的事，完成一种爱国的英雄壮举。像一个孩子拿放弃莫斯科，焚烧

莫斯科这一悲壮的必定发生的事件嬉戏,竭尽全力用他那无力的小手,一会儿推动,一会儿阻止那把他也卷进去的巨大的人民运动的洪流。

六

埃琳跟着朝廷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发觉自己处的位置进退两难。

在彼得堡,她受到一个身居国家要职高官的特别宠爱。在维尔纳,她与一个年轻的外国亲王有着亲密的关系。当她回到莫斯科的时候,那个高官和那个亲王全在彼得堡,两个人都表明有拥有她的权利。在埃琳的社交生涯里碰到了一个新问题——怎样才能保持她与双方的亲密关系并且不会得罪任何一方。

对于别的女人这是棘手的问题,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却一点也难不住这位有着绝顶聪明的女人称号的别朱霍夫伯爵夫人。如果她企图掩饰自己的行为,靠玩弄手段来摆脱尴尬的处境,那就是自认有罪,一定会不能达到。可是埃琳不这样,她像一个想要做什么就肯定能做到的真正的伟人一样,立刻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并确信就是这样,而把别人全部置于错误的位置。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怪她的时候,她骄傲地抬起头,转过半个身来向着他,坚定地说道:

“这就是男人的残忍和自私!我没有什么更好的期盼。一个女人献身于您,而她所能得到的回报,就是她还在受苦!殿下您有权利要求我报告我的友谊和爱情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父亲还亲的人。”

那个人刚要张口说话,但是被埃琳打断了。

“啊,是啊,”她说道,“他可能对我怀有比父亲更深的感情,所以我怎能把他拒之门外。我只是一个女人,不能忘恩负义,您要知道,殿下!我内心的感情只向我的良心和上帝袒露。”她说完,双手放在那高高挺起的胸脯上,两眼凝视着天空。

“但是,看在上帝的情面,请听我说。”

“让我嫁给您吧,我要做您的奴仆!”

“不过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呀!”

“您不愿屈尊来娶我,您……”埃琳说着,委屈地哭起来。

那个人开始安慰她,而埃琳却在出神地遐想,泪光闪闪地说,什么都可以阻挡她嫁给他,有过先例,说她从来不是她丈夫真正意义上的太太,只是个牺牲品。

“但是宗教,法律……”那个人说道,已经作出让步。

“宗教,法律……它们办不了这件事,那还要它们有什么用呢?”埃琳说道。

那个人特别惊讶,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未想到呢?于是他去请教和他关系密切的耶稣会的教友们。

几天之后，在埃琳的石岛别墅举行的一次迷人的晚会上，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已不太年轻、眼睛深邃明亮、头发雪白，颇具魅力的德若贝尔先生，他是个穿短衫的耶稣会教士。在花园里的音乐声中和彩灯照耀下，他和埃琳谈对上帝的爱，爱圣母圣心，爱基督，谈今生和来世唯一真正给予人们的慰藉的天主教。埃琳深受感动，德若贝尔先生和她的眼睛里涌现出了泪水，他们的声音也颤抖了。

她未来的良心指导者的谈话。但是第二天傍晚，德若贝尔先生独自去看埃琳，自那以后，他常常到埃琳那里去。

有一天，他把伯爵夫人带到天主教堂去，她跪在祭坛前。那个帅气的不再年轻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头上，据她自己后来回忆说，当时她觉得有一阵清风吹进她的灵魂。有人向她解释说，这便是神恩。

之后，她把一个穿长法衣的神甫带到她那里去。他听了她的忏悔，赦免了她的罪。第二天，她收到一个匣子里面装着圣餐，留在她家里供她领取。几天以后，埃琳欣喜地得知，她现在已经真正的加入天主教会，近期内，教皇就会亲自批准她入会，给她颁发证书。

这时在她旁边所发生的一切、人们为她所做的一切、特别多聪明的人用那么让人愉快的微妙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怀，以及她自己这时鸽子一样纯洁的状况——这一切让她感到满足，但是满足并不会令她忘记自己的目的。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愚蠢的人在耍手腕方面比几个比较聪明的人更厉害。埃琳明白，他费尽口舌，花了那么多心思，为的就是让她改信天主教，然后从她那里为耶稣会机关筹到捐款，埃琳坚持在拿出钱以前，一定要办好她与丈夫离婚的必要手续。在她的思想里，任何宗教的目的不过是在满足人们的欲望方面，保持一定的礼仪。她怀着这个目的和忏悔神甫谈话的时候，她一定要神甫回答她，她的婚姻对她有多大的约束力。

他们坐在客厅窗前，临近黄昏时，从窗口飘进阵阵花香。埃琳一身银装素裹，胸部和肩头都是透明的。神甫保养得很好，丰满的下颌胡须修剪得特别整齐，一双白净的手柔顺地交叠在膝盖上，一张令人喜爱的性感的嘴巴，他坐在埃琳旁边，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平静地欣赏着她的美貌，偶尔朝她脸上一瞥，讲述着他对那个问题的见解。埃琳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的鬈发和那饱满的、发青的、刮得光光的双颊，一直期盼谈话转入一个新的话题。但是，虽然神甫显然地在欣赏交谈者，高兴与她这样接近，却一味津津乐道地只顾谈他那一套。

灵魂指导者的言语如下：“您不清楚您所做的事有何意义，就向一个男人发誓忠于夫妇之道；他那一方呢，结了婚却不相信结婚的宗教意义，犯了亵渎神圣罪。这桩婚姻缺少它该有的双重意义。不过，虽然如此，您如果违背了誓言。那您犯罪是轻罪，还是重罪？轻罪，因为您那样做并没有邪恶的用心。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再次结婚，您的罪过会得到宽恕。但是又存在两方面这个问题：第

——……”

“但是我想，”感到无聊的埃琳突然笑容满面地说道，“我既然信了真正的宗教，我就要摆脱伪宗教对我的束缚。”

她的良心指导者对她提出的问题感到吃惊，就像对哥伦布的鸡蛋那么轻松地立在桌子一样。他为自己弟子的迅速意外的进步表示赞赏，但是他必须把握他用脑力劳动建筑起来的理论大厦。

“让我们来把问题弄明白，伯爵夫人。”他微笑着说道，继而反驳他的教女论点。

七

埃琳知道，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事情本来十分容易，因为她的指导者们顾虑世俗如何看待这件事呢，所以故意作难。

因此埃琳决定，在社交界先做舆论渲染氛围。她招到那个年纪大的显贵的嫉妒者，对他说一遍，她对另一个追求者说过的话，就是说向他提出，只有通过娶她这一唯一的途径才能取得占有她的权利。这个年纪大的要人一开始，也和那个年轻的要人一样，被和一个有夫之妇结婚的建议震惊了，但是埃琳的信心是如此坚定，认为这如同一个姑娘结婚一样地简单而自然，这影响了他。如果埃琳自己露出一丝动摇、害羞和遮掩的迹象，她的事情毫无疑问就失败了，但是她不但没有表现出害羞和遮掩的样子，相反，还带着天真温厚的神气告诉她那些亲密朋友，大官和亲王都向她求婚了，她爱他们两个，不想看到其中任何人痛苦。

顷刻间流言传遍了彼得堡，不是说埃琳要求与她的丈夫离婚，而是直接说埃琳不知道应该嫁给两人中的哪一个。问题已经不再是能否可以，而是选哪一个配偶更好，以及宫廷对这件事的看法。固然，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对此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个想法亵渎了婚姻的神圣，不过这只是小部分人，他们都对此不加评论，而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是埃琳嫁给谁更好。关于一个女人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再嫁人是坏还是好，都避而不谈，因为这对比你我更明智的人来讲（如他们所说），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如果对此表示怀疑，就会暴露出你的愚蠢，说明你不会在社交界周旋，没有人想冒这个风险。

只有这年夏天来彼得堡看儿子的梅琳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直抒己见，不顾公众的看法。在一个舞会上与埃琳不期而遇，梅琳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拦住，在一片沉寂中，用她那粗嗓门对她说道：

“也许您以为这是您的新发现吧？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您又要结婚了！有人告诉我了，不过有人已经走在您前面了，亲爱的！此计早有人实践过。在所有妓院……都是这么做的。”说完这几句话，梅琳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摆出她见怪不怪的威严吓人的姿势，卷起宽大的袖子，严厉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就从房间中

走过去了。

尽管人们对梅琳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怀有一种恐惧感,可是在彼得堡她被人们当做一个丑角,所以,关于她说过的话,人们仅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粗鲁的字眼上,并互相小声重复着,那个字眼体现了她的所有意义。

沃希列公爵最近很健忘,同样的话能重复上百遍,每当遇见他女儿时,都说:

“埃琳,我要与你谈谈,”说着把她拉到一边。“我听到某些关于……咳,你是知道的。唉,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心里高兴,你……你受了很多苦……但是我亲爱的孩子,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吧。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于是他隐藏着他惯有的激动,把他的脸往女儿脸上贴一下,就走开了。

一直保持聪慧过人名声的别列彼是埃琳亲密的朋友,是那种经常在显赫的女人堆中晃来晃去,永远不会变成情人的男朋友,有一次在一个亲密朋友的小圈子里,对她谈了他对这些事的看法。

“您听着,别列彼,”埃琳说道,并用她那戴满戒指的洁白指头碰了碰他的衣袖。“请您告诉我就像对您的姐妹那样,我应当如何做?两个中应选哪一个?”

别列彼皱着眉头,嘴角上带着微笑,考虑了片刻。

“您的问题并不会让我觉得突然,您知道吗?”他说道,“作为一位真正的朋友,我仔细地考虑了您的问题。您看,您成为那个亲王的妻子,”他弯起一个手指头,“您必将永远失去成为另一个人妻子的机会,而且,宫廷也不会满意的。您要是做那个老公爵的妻子呢,您会令他的晚年幸福,然后……亲王不用屈尊就会娶您这个大人物的遗孀了。”别列彼前额的皱纹逐渐消失。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埃琳眉飞色舞地说,又拽了拽别列彼的袖子。“可是,我两个都爱,我不想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痛苦。为了他们两人的幸福我愿意牺牲一切。”她说道。

别列彼耸了耸肩膀,以示,对这样棘手的事,他也无能为力了。

“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同时以三个人为夫,她可真不简单啊!”他想道。

“但是,请问,您的丈夫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别列彼问道,由于他名声赫赫,他敢提出这个有失尊严的天真问题吗?“他会答应吗?”

“啊,他是那么爱我!”埃琳说道,不知什么原因,她觉得皮安奥也爱她。“他为了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别列彼眉头一皱,表明他要说俏皮话了。

“甚至休了您?”他说道。

埃琳大笑起来。

一些人敢于怀疑拟议中的婚事的合法性,埃琳的母亲科劳辛娜公爵夫人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一直因嫉妒女儿而苦恼,而现在女儿的事使她更加嫉妒,她怎能会不闻不问。她请教了一个俄国牧师,询问在丈夫健在的时候离婚和再嫁是

否可以，牧师对她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令她愉悦的是，牧师指着给她的《福音书》的经文，肯定了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能再嫁。

清晨，公爵夫人就坐车去她女儿那里了，那些她自认为不可反驳的证据促使她这样与女儿单独见面。

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以后，埃琳讥讽地温和地笑了笑。

“书中不是白纸黑字地写着了吗：‘谁娶离婚的妻子……’”老公爵夫人说道。

“哎呀，妈妈，不要说傻话了！您什么都不明白，处在我的位置，我有义务。”埃琳先用的俄语，现在改成了法语，她总觉得用俄语表达不清她的意思。

“但是，我亲爱的……”

“哎呀，神甫有宽恕的权利，妈妈，您为何就不明白……”

正在此时，走进一个女人，她是住在埃琳家的女伴，她说，殿下希望见埃琳，他正在大厅里等着。

“不，请转告他，我不想见他，因为他不诚守承诺，我很生气。”

“伯爵夫人，任何罪过都应得到宽恕。”一个长鼻子、长脸、金发的年轻人走过来说道。

老公爵夫人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行了屈膝礼。进来的那个年轻人对她视而不见。公爵夫人对女儿点了点头，轻飘飘地朝门口走去。

“不，她是对的，”老公爵夫人想道，她所有的信念都消灭在殿下出现的那一刻。“她对了，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些呢？而这是如此简单。”老公爵夫人坐在马车上想。

八月初，埃琳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她给丈夫（她认为丈夫很爱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她计划嫁给 N. N. 并说她已经正式加入了唯一真正的宗教，她请求他办理所有必要的离婚手续，送信人会向他说明那些手续。

“我的朋友，为此，我祈祷上帝给予您神圣有力的保佑。您的朋友埃琳。”

当皮安奥收到那封信的时候，他正在勃洛杰罗战场上。

八

在勃洛杰罗战役即将结束时，皮安奥第二次从拉耶夫斯基炮台跑下来，与一群士兵一道沿山谷往克尼亚兹科沃走去，到急救站，一看到血，听见呻吟声叫喊声，他又急匆匆地钻到士兵群里继续前进。

这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摆脱今天遇到的可怕的事情，回到正常环境中去，在房间里自己的床上，无人打扰地睡一觉。他觉得，只有在正常生活状况下，他才能明白自己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但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种条件了。

虽然在这里，他走着的大路上已经没有炮弹呼啸了，但是附近的情形还如同